

思想中来的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形象分析

张海英

(湖南大学期刊社,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不少人认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形象钱文贵塑造得非常成功。然而,通过对钱文贵与程仁、黑妮、刘满等人的关系及他的反动言行的分析,发现这个人物是充满矛盾、模糊架空的:他有恶霸之名,却无恶霸之实,只要抽去作者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评论性的叙述,他的恶霸形象便架了空,作者想表现的和她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个人物是作者思想中来的,二是作者的生活积累不够。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钱文贵;地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2-0230-04

一

大凡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下文简称《桑干河上》)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人们认为作者除塑造了一批新的农民和干部形象外,也生动地塑造了一些地主恶霸的形象。自《桑干河上》发表伊始,不少人就对钱文贵这个形象的刻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

地主钱文贵是写得非常成功的,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丑角,也没有简单地只写他的表面上的穷凶极恶,而是深刻地从一个地主阶级的心理过程去发掘,写出他的深谋远虑和随机应变……作者通过这样深入的心理发掘,以及农民群众对于钱文贵的心理感觉,和钱文贵的地主权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很饱满地表现了这样一个恶霸地主人物。这里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于农村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1]。

书中几个地主各有特色,孱弱胆小的李子俊,狡猾投机的江世荣,威风扫地的侯殿魁,一个个如秋风中的落叶,衬出了垂死挣扎的恶霸钱文贵的阴险。^[2]

毫无疑问,在解放区创作的恶霸地主形象中,钱文贵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2]。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地主钱文贵……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3]。

《桑干河上》的主题是农民在干部和土改工作者的领导下觉悟起来,斗倒地主,重分土地。因此,人物便分成两个阶级分明的阵线:包括土改工作者在内

的农民和以钱文贵为中心的地主。而斗倒钱文贵,才能搬掉压在农民心上的石头,保障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钱文贵成为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钱文贵这个地主形象是并不出色、并不成功,完全说不上“深刻”“饱满”,而是充满矛盾、模糊架空的。

二

在作者的笔下,钱文贵是一个恶霸地主,或者说,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塑造一个“恶霸地主”,但从文本来分析,却很难找得出他称得上“恶霸”的事实。书中提到的恶霸陈武,恶行远近闻名:“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4]这些,钱文贵一条都没有。同样是描写土改工作的《暴风骤雨》,里面的地主韩老六,被他“亲手整死的人命,共十七条。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5],可谓血债累累,人神共怒。至于钱文贵呢,虽然作者在小说中自始至终地渲染钱文贵是暖水屯“八大尖里面的第一尖”,但也自始至终没举出一件说明他之所以成为“人尖”的证据;又说他“要坑害人可便当”,可除了刘满的一面之辞说自己是受了他的害外,也没见他再坑害谁。斗争钱文贵时,给他的定性是“恶霸”,“该个死罪”,找他算帐的人“一个接一个”。

但小说中具体描述的受他迫害的人仅顾涌、黑妮、程仁、刘满、张真等，这些人到底受到了怎样的迫害，吃了他什么亏呢？笔者来做个详细分析。

先说顾涌。顾涌是因为梨树被钱文贵的柳树压折了半边，而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很为他不平的，到底是怎么压折的呢？小说中讲得很清楚：“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风，柳树便倒下来，横到渠这边，压在顾家的梨树上，梨树压折了半边。”虽说是“稍稍动了一下”，但钱文贵的柳树却确实是因这一动才倒下的，你不动它还不会倒呢，钱文贵说要赔树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何况只是“要顾顺赔树”，到底赔没赔作者也没交代。不管怎么说，只一棵树的官司，这种事在乡里很平常，以这件事来说明钱文贵的“为非作歹”，说服力太小。

另外是二姑娘的婚事，顾二姑娘“说不上什么美丽漂亮”，钱义呢，“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年轻人，后来还参加了八路军，似乎没什么配不上她的。儿子大了，钱文贵托人来顾家问聘，又非强娶，似乎也没什么不对。二姑娘嫁过去，虽有些过不惯，但“生活上总算比在娘家还好”，也“不怎么劳动”，夫妻也甚为相得。问题是二姑娘很怕她公公，但也没见钱文贵对她怎么样，更没听说钱文贵对别的姑娘媳妇怎么样，连风流娇气的寡妇白银儿那里也不曾有钱文贵的踪影。查无实据，这也很难算一条罪状。

再说黑妮。黑妮五岁上死了父亲，七岁上母亲再嫁时，钱文贵主动把她要了过来抚养，又送她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上了学。想想当时女孩子上学的不容易，很多比较富裕的人家亲生的女儿也没有上学的机会（从妇女识字班请黑妮当教员来推断，暖水屯上过学的女的大概就只有黑妮姐妹），钱文贵待黑妮并不薄，他如果只想因为她长得不错便“希望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那他似乎不应下如此大的成本。

作者又说钱文贵家“把她当一个丫鬟使唤”，但我们在文中读到的，是她“回到家里还常常出来玩”，“常常到他（指大伯父）园子里去玩”，也能经常和程仁在外面约会。她在行动上也很自由，这从她和女伴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去开会和去识字班当教员可以看出来。

黑妮感到不自由的地方是她的婚姻。她爱程仁，可“钱文贵是不会让他侄女儿嫁给一个穷光棍的”，这并不是因为黑妮是她侄女儿，在当时的情况下，换了是他的亲女儿大妮，他也不会答应的。

黑妮最大的痛苦是她的孤独寂寞，没人疼，没有人理解。伯父、伯母既不真正喜欢她，大伯父也帮不上忙，程仁因避嫌疑故意冷淡她，在家里不能和地主家庭融在一起得到理解和照顾，在外面却因为是地主的侄女而到处受排挤打击，如在董桂花家里就碰了钉

子。这种和周围世界总是格格不入的痛苦才是黑妮无法摆脱的噩梦。但这种感情却是作者强加在她身上的，在精神上和莎菲、贞贞、陆萍等一脉相通，是作者“喜欢过的感情”^[6]，在现实中是缺乏依据的。

黑妮的不幸来自幼年的父死母嫁，而不是来自钱文贵，倘不是钱文贵的收留，黑妮的前途更难以预料。钱文贵确实是“不喜欢她”，但却也尽到了一个伯父的责任；虽然在婚事上没有如她的愿，但也没对她采取什么行动；虽然想借她施美人计，但美人计的对象却正是黑妮喜欢的程仁。钱文贵说不上对她好，但绝对不能说“压迫”她。黑妮虽然脱离这个家庭很快乐，但对这个家也无深仇大恨，从她答应去找程仁帮助这个家渡过难关就可以看出，黑妮对她的伯父、伯母并非全无感情。

接着说到程仁。如果说黑妮不曾受到钱文贵的虐待折磨是因为作者在初稿中按照原始构想是把她写成地主的女儿，后来才改为钱文贵的侄女^[7]，所以虽然一再强调对她的“压迫”却自始至终并无有关压迫的具体描写，那么，我们虽然可以责备作者修改时的疏漏，但也多少可以为黑妮未曾受压迫找一个借口。不过，当看到作者对另一个人物——程仁与钱文贵关系的描写同样半点反映不出钱文贵的恶霸行径时，我们对钱文贵的恶霸身份疑惑了。

钱文贵来到斗争会，程仁是第一个冲上去骂他、同他算帐的人。程仁来势颇凶，骂得也很厉害：“你这个害人的贼！你把咱村子糟践得不成。你谋财害命不见血，今天是咱们同你算总帐的日子，算个你死我活，……”^[4]程仁口口声声说算帐，他是怎么算的呢？

“父老们！你们看看咱同他吧，看他多细皮白肉的，天还没冷，就穿着件绸夹衫咧！你们看咱，看看你们自己，咱们这样还像人样啦……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作为农会主任的程仁，思想上肯定比普通农民进步些，对地主恶霸的本质也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作为钱文贵的长工和佃户，他对钱文贵又了解得很清楚，并且由于党员大会上大家对他的不满意和章品的批评，他已下定决心“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因此，这时的程仁可说是毫无顾忌地跳上去找钱文贵算帐的。可是他算了什么具体的帐呢？除了骂钱文贵不该穿绸夹衫，他再也找不出钱文贵的恶行，举不出钱文贵对他的迫害事例。所谓“总帐”，却原来是一无所所有。他无帐可算，便只好口号式地、公式般地叫嚷了几句，而这虚张声势的几句，又不过是为了表明他没有“落在群众运动的尾巴上”。他的内心里，实在对钱文贵没什么大的仇恨，他自己很清楚：“他疏远她，只不过为着骗人，并非对她的伯父，对村上一个最坏的人，对人人痛恨的人有什么仇恨。”

事实上,钱文贵除了最初不同意黑妮嫁给他这一件事外,确实没有对不起程仁之处:虽停了他的工,却抽出了几亩地给他种,没有逼走他,也没有加害他,相反却有几分眷顾之意。

最后说到刘满。小说中惟一与钱文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是刘满。刘满一出场就是找张正典的碴,一见张正典走了,便含沙射影地说:“白天也见鬼,嗯,邪究不压正,你们看,嗯……溜了。”以至文采“觉得这人有些神经失常的样子”。他女人也说:“咱们老二是个疯子,如今,你看他这样儿,也不差啥了。”他向杨亮诉苦,也有些颠三倒四,顾头不顾尾,末了是“夹七夹八的嚷了一阵”。不过,尽管刘满被仇恨烧得有些不正常,我们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据刘满说,钱文贵是通过以下三桩事使得他家破人亡的。

第一桩,撵掇他爹开磨坊,又引来一个朋友做伙计,末了,那人卷了骡子麦子逃走了。姑不论“两匹大骡子千来斤麦子”在五个爷们的家里要卷逃是多么的不容易,只说钱文贵事后的处理:“他骂那个朋友,说连累了他,他拉着咱爹,一同到涿鹿县去告状,官司准了。咱告诉大家这官司可打不得呀!咱们一趟两趟赔钱,官司老不判案。”出了事,去县里告状,这是钱文贵尽责任的表现,要是他袖手不理,岂不更遭怨恨?至于一趟两趟赔钱,又不是赔给钱文贵,在这场官司里,他没得到任何好处,官司不判案,也是县里吏治腐败,以钱文贵一个乡村小地主,是左右不了这桩案子的。他和刘家宿无积怨,荐个人来做事,也很平常,很难认定他是蓄意弄鬼。

第二桩,把刘满大哥绑去当兵。虽然在当时拉伏、抓壮丁的事多如牛毛,但刘满一口咬定,“这还要说么,这里面是有人使了诡计啦!”奇怪,弟兄四个,就怕老大来寻仇么?还有三个呢?干嘛不斩草除根,干脆一锅端了?似此打草惊蛇,只会后患无穷,钱文贵真的失策。

第三桩,找刘乾当甲长,逼疯刘乾。“钱文贵找咱二哥去说,过去对不起咱爹,磨坊赔了钱,他心里老过意不去,他说要帮咱们忙,劝咱二哥当个甲长,说多少可以捞回几个。”在日本人政权底下当甲长捞了一笔的人多的是,江世荣就是榜样,当甲长时修了新房子,粮食一夹墙,衣服多得穿不完,地也占了一百多亩。钱文贵的话,怎么定是恶意呢?刘乾没捞上,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尽管刘满认定钱文贵居心不良,读者仍可从刘满的原话中发现钱文贵此举的出发点未必不是真心想给刘家帮忙。

以上三件事,皆是钱文贵不在场的情况下刘满的一面之辞,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就是从刘满的一面之辞中也无法看出钱文贵对刘家蓄意的谋害。虽然刘满把家破人亡的帐全部算到钱文贵的头上,读者却无法

和他取得同感。

钱文贵之所以成为“恶霸”,除了在村上为非作歹,压迫剥削村人,另外一条就是政治上的反动。作者多次提到这一点,如撵掇任国忠散布“共产党不一定能站长”的谣言、编几条国军打胜仗的消息。作者甚至用“密谋(一)”“密谋(二)”两个章节来写他和任国忠的密谋。但所谓的“密谋”不过是说说共产党站不长、中央军不一定哪天会来而已,或者说说李子俊的坏话,并没有任何反动的行动,如果去掉“密谋”的大标题,便仅仅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何况,这话不只钱文贵说,别人也说,连张裕民都承认有个“变天思想”。

如果说钱文贵最希望“国军”打过来,共产党站不长,那又怎么解释他送儿子参加八路军,把女儿嫁给治安员?这是掉脑袋的事,如果“国军”真打过来,他的一儿一女马上得完蛋,还会连累他这个“抗属”。在暖水屯,他是和共产党命运联系得最紧密的一家,共产党的长久与否决定着他一儿一女的生死存亡。作者一再说他“狡猾”,人称“赛诸葛”,却顾此失彼地忘了帮他打算打算一对儿女。

虽然作者在文章前面部分多次渲染钱文贵的狠毒和村民对他的仇恨,但因为这仇恨实际上的不存在,而使得斗争钱文贵的大会简直成了一场闹剧。这部分是全书的高潮,作者花了三个章节以“决战一、二、三”来描述它,但第一节只写了会场的杂乱无序,第二节写张裕民的报告和刘满的控诉,当写到张真上台时,作者说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又哭起来了”,这哪是张真说不出话来,分明是作者无话可写,无苦可诉!第三节方正式写对他的批斗。钱文贵被押到了台上,受他压迫的农民和他面对面,积压的仇恨就要爆发,千百年的奴隶就要翻身,血泪的帐就要一笔笔地清算——可是,很不幸,却冷了场,要不是程仁跳上去吼了两句,还不知如何收场。于是,接下来,便开始了对钱文贵的打骂和戏弄,要他写保状。当我们读到钱文贵“已经神志不清,却还不能不提起那枝发抖的笔,一行行的写下去”的时候,当他写着“蒙全村穷大爷恩典”,不停修改保状,人们对他得意洋洋地辱骂刁难的时候,读者的同情心竟倾向了地主这一边。笔者想有不少人不会觉得地主可恨,倒会觉得批斗他的人可悲、落后,有一副“小人得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可笑嘴脸。

三

通过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出,钱文贵虽有恶霸之名,却无恶霸之实,只要抽去作者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评论性的叙述,他的地主形象便完全架空,而从对他的具体描写,如收养侄女、和治安员联亲、送儿子参加

八路军等事件中，则可分析出一个不乏温情、倾向进步的地主形象。作者丁玲的原意是写一个恶霸地主，而最终，除了作者给他套上的“恶霸”帽子外，其所作所为很难被评说是一个“恶霸”。作者想表现的和她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互相背离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丁玲曾谈过这个人物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在选择地主形象上，我也费了很多考虑。有各种各样的地主：一种是恶霸地主象陈武一样强奸妇女，杀人；一种象钱文贵这样的地主。究竟要什么样的地主呢？那时候我手头有好多材料，从这些材料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写一个恶霸地主吧！我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地主里有很多恶霸，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叫人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地主，一跳脚几条河几座山都发抖的人，就能镇压住一个村子。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表现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所以说这个形象（指钱文贵）还是从我思想中来的，思想先定了，然后选择了他。我常常选择人物都是从思想里来的^[8]。

作者说得很清楚，钱文贵这个人物是从思想中来的。作者要“写一个恶霸地主”，于是搜集材料，决定写一个“不是很突出的地主”。作者大概想另辟蹊径，写一个别样的恶霸地主，但作者的主观愿望落空了，她写出来的根本不是恶霸，她想表现的和实际表现出来的两回事。由于作者写之前就有了一个思想，认定了“即使他不是恶霸……，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这样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人、分析人，因而，钱文贵所作所为全有“不良动机”，包括送儿子参加八路军也

变成了一种“投机”。这大概是最早的“血统论”，也是以阶级出身判定人物好坏的绝好样板。思想里来的人物毕竟是思想里的，他缺乏真实性、典型性，因而前后矛盾，表里不一。

再就是，丁玲虽生在农村，却长在城市，农村于她是陌生的。她参加了几个月的土改工作。“我在涿鹿温泉屯村里参加了一个月的工作，经常和老乡们在一块儿。今天和这个聊，明天又找那个聊……”^[8]，因而她对农民的生活比较熟悉，而关于地主的生活，却都是从一些材料上得来的，而书里面的那些人物又“都不是真人”^[8]。这导致她在描写地主时，觉得生活积累得不够，因而写出来的人物只是一个空架子。

参考文献：

- [1] 丁易.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C]//袁良骏. 丁玲研究资料(乙种).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342-350.
- [2] 黄修己.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 [3] 袁良骏. 丁玲[C]//徐迺翔.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二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347-382.
- [4]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5] 周立波. 暴风骤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179.
- [6] 丁玲. 生活、思想与人物[C]//丁玲文集(第六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203-224.
- [7] 张永泉. 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10.
- [8] 袁良骏.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C]//丁玲研究资料(乙种).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208-219.
- [9] 丁玲. 我的创作经验[C]//袁良骏. 丁玲研究资料(乙种).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05-107.

The character from the author's mind —On despotic landlord Qian Wen-gui in *The Sun on The Sanggan River*

ZHANG Haiy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Some critics think that in Ding Ling's novel *The Sun on The Sanggan River*, Qian Wen-gui is a well-created character, bu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finds this character is something repugnant and indistinct through analyzing his actions and works as well as his relation with Cheng Ren, Heini, etc. Qian Wen-gui is a despotic landlord on the surface, but he didn't do what a landlord had done. If we take out the novelist's commentary narration about Qian Wen-gui, he is no longer a despotic landlord. What the novelist wanted to express and what she had expressed is inconsistent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the first, this character came from the novelist's mind, and the second, the novelist lack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untryside life

Key words: *The Sun on The Sanggan River*; Qian Wen-gui; landlord

[编辑：苏慧]